

“偶像破坏时期”的江南意象

——哈佛燕京所见近代日本江南纪游诗四种述略^①

胡 晓 明

自1862年“千岁丸”首次上海之行,经由上海进入长江的航道便成为近代中日首选的海陆交通要道,由上海至四川的长江两岸,成为最常见的旅行行程。其中尤其以长江下游的江南旅行^②,成为停留人数与时日最多的观光区域。因而,学者、官员、商人、军人、浪人等各种层次的日本人旅行游记渐多,一种古老而新兴的文学传统正在加快流行,其中“江南意象”突出地放大。就我所见,到过江南并记录江南的相关游记作品有:幕末明治时期有曾根俊虎《清国漫游志》、纳富介次郎《上海杂记》、宇野哲人《支那文明记》、竹添进一郎《栈云峡雨日记》、冈千仞《观光纪游》、峯洁《清国上海风闻录》、后藤昌盛《在清国见闻随记》、永井禾原《观光私记》、德富猪一郎《支那漫游记》、河东碧梧桐《支那游》、诸桥辙次《游支杂笔》等二十余种^③;大正时期有上冢司《扬子江中心游》、竹内逸《支那印象记》、鹤见佑辅《偶像破坏时期的支那》、迟冢丽水《新入蜀记》等^④,以及国内已经译介的内藤湖南、青木正儿等的多种著作。近代中

①这四种是:股野蓝田《苇杭游记》(明治四十二年,1909)、伊藤鸳城《江南游藻》(大正五年,1916)、松田敏《禹域游草》(大正九年,1920)、前田慧云《吴楚游草》(大正十一年,1922)。其中,松田没有到北方,他的“禹域”主要指吴越楚蜀,而股野的篇幅中,南中国尤其是江南的偏多。因而本文就其江南部分作探讨,姑且称为江南纪游诗。

②本文的江南,依日本近代学界的惯例,为包括洞庭湖流域在内的大江南。本文所涉及的对象如《江南游藻》,即如此使用“江南”一语。然而本文更集中论述有关杭州、苏州、南京、上海的作品。

③小島晋治監修:《幕末明治中国見聞録集成》第1-20卷,東京:ゆまに書房,1997年。

④小島晋治監修:《大正中国見聞録集成》第1-10卷,東京:ゆまに書房,1991年。关于日本人西游的游记,据张明杰说:“国立国会图书馆支部的东洋文库收藏为最,该文库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于1980年编辑出版了《明治以降日本人的中国旅行记解题》,对该文库所收藏的明治(1868-1912)、大正(1912-1926)、昭和(1926-1989)三个时期(截止至1979年)逾四百种中国游记,作了简要提示或简介。其实正如此书前言所及:‘这个数字与明治以来日本出版的全部中国旅行记相比,只是九牛一毛而已。’”(张明杰:《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总序》,见《考史游记: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2页)尽管昭和时期占了这个数量的三分之二,然而前两个时期的遗失仍然相当大。

日文化交流史以及上海史学界已经涉及到对于这些游记的利用^①,对于日人在华游览诗的研究与介绍,近年来已有陈福康、蔡毅等人的研究成果,但具体到江南纪游文学,仍有较多的论述空间^②。

据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调查,已经收入大型总集《日本汉诗》的诗人中,仅在近代幕末明治大正时期,即中国的晚清民初,写过江南游览诗的,有竹添进一郎(《栈云峡雨诗草》)、副岛种臣(见《苍海全集》)、森槐南(见《槐南全集》)、岩溪晋(《裳川自选稿》)、本田种竹(《戊戌游草》)、永井禾原(《来青阁诗集》)、田边为三郎(《碧堂绝句》)、田边太一等十余人^③,而哈佛燕京所藏松田淞雨《禹域游草》等四种^④,其中三种未收入《日本汉诗》,有两种亦未曾著录于任何一种诗学目录或见称于任何一种诗学论著,因而具有较新鲜的文献价值^⑤。这四位用汉文写作的诗人,具有达官、诗人、学者、教师等不同的身份,都到过上海、杭州、苏州、南京等江南中心城市。他们在作品中所反映的地域,恰是所谓“偶像破坏时期”的中国之江南;他们既有较多样的身份,代表较广泛的近代日本社会阶层,也属于较为保守、对中华文化有较多感情与了解的日本汉诗写作者,身处近代日本社会心态对中华文化由仰慕转为轻蔑的时期,而他们原先所珍视的诗歌文化如何参与近代心态的大变化,由此不仅可以以点代面,透视偶像破坏时期变化的中国观,而且可以观察“想像的中国”转变而为“风景江南”或“意象江南”的虚实嬗变,由此反观近代江南美感经验在近代转型中的丰富面相,无疑是十分有趣的诗学课题。

①王晓秋:《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张明杰:《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黄俊杰:《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第玖《二十世纪初期日本汉学家眼中的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6年。

②陈福康《日本汉文学史》第四章《明治以后》第十一节《旅游中国的汉诗》,论及从明治到民国十九名汉文学家的纪游文学,其中到过江南的有大半(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06-308页)。蔡毅《日本汉诗论稿》(中华书局,2007年)中论及日本汉诗的西传踪迹,尤其是明治时期的情况,如《长崎清客与江户汉诗》论述清朝的商客如江芸阁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汉诗)的作用(第232-254页);《陈曼寿与〈日本同人诗选〉》论述该书是第一本中国人编辑的日本汉诗,而不是俞樾的《东瀛诗选》(第255-272页)。又如《俞樾与〈东瀛诗选〉》一文,论述了回流的个案(第273-301页),等等。

③此外,陈福康《日本汉文学史》中《旅游中国的汉诗》一节,论及近代写过江南纪游诗的,还有日下部鸣鹤、王半田、冈田淮海、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

④据沈津先生对笔者说,哈佛这批近代日本的汉诗别集,约有五百种,大部分都未曾著录。应是汉语文学在海外的一笔巨大且未开发的资源。

⑤陈福康《日本汉文学史》中有两页的篇幅介绍松田淞雨《禹域游草》(第306-308页),似是唯一论述这部诗集的著作。

一、四种诗集的版本、作者与主要内容

1.《苇杭游记》(不分卷,共七十页)

著述人股野蓝田,无版权页。明治四十二年印行(排印本)。扉页有“遯健明治己酉一月,公爵博文题”、“探古迹 养文心 摘录蓝田翁留别诗中语以代题言。光显”等字。

股野琢(1839-1921),字子玉、蓝田,号邀日楼主人。播州龙野质达轩之子。明治四年(1871)入教育部,曾任内阁记录局长、宫内省书记官、帝室博物馆总长、内阁顾问官等。有《介寿集》。

《苇杭游记》记叙了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光绪三十四年),作者从日本始发,经韩国,从北向南游历大半个中国的散文游记及诗歌。包括序言、正文、附录,其中正文的前半部分记叙的多为韩国、中国北方的事迹,与江南无直接关系,后半部分是游南京、扬州、苏州、杭州,经上海而返长崎的游记兼诗。其编排方式完全是按照日记式的以日为题。

是集较可贵的是,几乎每一页的天头都有评点。有三岛中洲、土屋凤洲、信夫恕轩、竹添井井、重野成斋、森槐南等明治时期著名诗人的参加。集末有三岛中洲、重野成斋、森槐南的跋文,以及永井禾原、大江敏香、秋月天放、芳川越山、末松谦澄、土居香国、森槐南、山口霞村等二十余人以及中国江南诗人瞿鸿禨等人的次韵留别诗。瞿氏与股野氏有父执之谊,称他为“海外诗仙”。

书中有著名诗人信夫恕轩、土屋弘及省轩龟谷的序。信夫从汉文学的纪游文学大传统来论述,认为“放翁《入蜀记》,有此清秀可爱,而无此奇异峻拔;石湖《吴船录》,有此奇异峻拔,而无此清秀可爱”。土屋从私人纪游与宦游文学两种传统的合一来表彰。最有意思的是省轩龟谷,分明从南北中国的不同特色着眼:

过山海、居庸二关,瞻万里长城,风云惨淡,飞沙扑面。度易水想荆卿,水声犹怒,于是乎,苍苍莽莽,幽燕千古之感,郁勃毫端焉。余不觉浮一大白读之。既而逾黄河,望明月于武昌,开快帆于洞庭,听歌秦淮,揽奇西湖,则其诗清秀,领吴楚芳华。余又浮一大白读之。

2.《禹域游草》(不分卷,共七十页,一百四十九首诗)

著述人东京土族松田敏,大正九年十月(排印本)。

作者松田敏(1847-?),号淞雨。曾为松江地方法官^①。退休后是一隐居于城市的汉诗人,晚岁开馆授徒。其弟子高桥顺有诗《淞雨先生瑜洲先生捐馆既十七年淞雨雪田两先生亦相踵即世怀旧怅然为三贤咏》云:

^①诗集中有《席上赋似主人岳翁诸冈氏》,自注有“明治八九年之交,余与诸冈氏共司民刑裁判,同在松江鸟取法衙”云云,可知其曾为松江地方法官。

先生性恬淡，昂昂云鹤姿。晚节隐城市，吟咏寄幽思。穷通附云烟，超然脱尘羁。身虽居人境，神游白云陲。老大始执贽，绛帐久仰师。烟霞趁兴乐，江山载笔随。诗风旨敦厚，六义极幽微。长留天地间，西游百篇诗。（《守真草堂诗存》卷一）

大正六年（1917）三月，松田敏游历江南八十五天，时年七十馀岁^①。此行有诗百馀篇，辑为《禹域游草》。一百四十多首诗中，有一半是写江南。前有《自叙》，略云：

大正乙卯三月，上海亲戚高野氏寄书劝予游于禹域，余欣然理装泛海。是月十三日达上海，寓高野氏家。十六日驾轮船泝江，望焦山、北固，经镇江、彭泽、浔阳、武昌、赤壁、汉阳、荆州，抵宜昌……既而下江。数日而抵南京，驰马车观明故宫及谒太祖陵，遍探诸胜，夜宿蓬莱馆。明日再抵镇江，游焦山、北固、甘露寺、金山寺，宿迎氏家。夜半搭火车游苏州，夜归上海。越月更游杭州，探西湖之胜，宿湖畔新新馆。是行为日八十有五日，行程凡五千七百哩，春夏之交，落花舞风，绿阴凝黛，杜鹃啼血，不堪俯仰今昔之感……禹域之游，中古则有秘书晁监、浮屠空海，輓近探讨之诸家颇多，皆有记游，如《栈云峡雨日记》、《观光记游》、《苇杭游记》诸篇是也。予所赋之诗，古今体若干篇，题曰《禹域游草》。

他所提到的游记如竹添进一郎（1842-1917）《栈云峡雨日记》（又有《栈云峡雨诗草》）、岗千仞（1833-1914）《观光记游》、股野琢（1839-1921）《苇杭游记》，皆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游记，作者皆到过江南，或以江南为游览的中心。由此可见此书是作者向这样的明治文学传统致敬之作。

3. 前田慧云《吴楚游草》（不分卷，共四十八页，一百二十二首诗）

著者兼发行者前田慧云，大正十一年（1922）六月十日印刷（刻本），大正十一年六月十三日发行。扉页有自题诗：“归卧草庐岁云暮，游踪回首半茫茫。西湖烟雨洞庭月，也是浮生梦一场。”署款“丁巳岁□□作，止舟斋人□”（□处，辨识不清），作者号“止舟”，此应是作者的手书。

此稿虽封面题为《吴楚游草 辽韩吟草》，但其实最后一页《辽月韩云吟草》只有三首诗，不足成集。可能是未完成之作。由此也可知北方其实没有多少诗料，真正的诗料在“古典事物”中^②。

前田慧云（1857-1930），明治、大正时期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宗师，号止舟斋、含润，谥号含润院。出生于三重县伊势市西福寺，1880年继任该寺住持，

①《大正二年四月，高野氏来自上海，欢醺徵逐度日，偶劝余游禹域。越四年三月四日，忽接电报：君若来游，今为好期。以此月七日，搭春日舰而发，既嘱舰长，于是苍黄结束上程，临发题壁》云：“老翁七十馀狂骨，踏破支那四百州。”

②青木正儿《江南春》：“议论归议论，诗趣却要求我注目古典的事物。”（王青译：《两个日本汉学家的中国纪行》，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101页）

1900年赴东京，任教务讲习所长，1903年任高轮佛教大学校长，1905年任《（靖国纪念）大日本续藏经》主编，1906年任东洋大学校长，1917年任西本愿寺顾问，1922年任龙谷大学校长，著有《大乘佛教史论》、《本愿寺派学事史》、《真宗学苑谈丛》等，现有《前田慧云全集》八卷刊行于世^①。

作者于大正六年（1917）十月十日从神户出发，入上海，游苏州、嘉兴、杭州、南京，然后再乘船下汉口、经长沙，游洞庭、宜昌、江陵，然后折返镇江，泝运河抵扬州，然后再回镇江，经苏州、上海，十二月一日启程返回日本。历时五十天，得诗约一百二十余首。大部分作品写苏州、杭州、金陵。

4.伊藤鸳城《江南游藻》（又名《江南三十图诗画》，不分卷，共六十二页，六十四首诗）

大正五年（1916）六月十日印刷（排印本），大正五年六月十五日发行。

伊藤谦（186？-1937），字士兼，号鸳城，广岛人。似未出仕，属当地汉诗名流。书前有友人渡边白峰的序，略云：“偶会鸳城伊藤翁于南都三笠山下，得观翁江南实探诗画三十图本。喟然叹曰：即是真个支那名山活画……凡江南真山水之脉络，历历可凭证。呜呼，今世无士大夫之画者久矣，今而始观之，何快复加？顾今世善画之人，未必善诗，善诗之人，未必擅画。或虽兼有远凌洞庭之浩淼，深冒三峡之险巇，诗之画之齐归者，除翁之外，天下殆始无人。呜呼，翁之业可谓伟矣。”表明此著的特点是合诗画为一集^②。

据集中《癸丑六月念二日风雨溯三峡留泊万县》、《山阴兰亭图》“癸丑恰逢二十六”，以及《江南三十图》第一《上海吴淞图》中自注“余初往时正春可”，可知，诗人于大正二年（癸丑，1913）的春天由上海入中国，游苏州、杭州、南京等地，于同年六月回到日本。三十幅图中，只印了三幅，大部分写苏、杭、宁的名胜。

书前有吴昌硕、内藤湖南、拜山、木苏牧等人的题辞或题诗。如吴昌硕题辞云：“东邦近世以汉诗称者，有森槐南君，大著颇似之。盖汉诗之佳处，曰风韵、曰态度、曰声调，能喻此，可以颉颃前辈矣。癸丑六年读鸳城先生纪游诗。老缶。”内藤湖南的题诗，最末一句作“重从画里忆江南”，《内藤湖南汉诗文集》作“空从画里忆江南”（第18页）。案，“空”应作“重”。

二、近代日本汉诗人的江南认同与心理落差

下面略述四部汉诗的共同特色。

1.南北区分与文化认同

日本汉诗人对于南北中国的不同特点，有明确的认识。他们常常会用“南

①感谢蔡毅教授提供此条资料。又参见佛缘网站 <http://cidian.foyuan.net/word/328763/>。

②内藤湖南有《题吴山楚水册乃大谷尊由上人画光瑞法主所题咏》（《内藤湖南汉诗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页），可见江南诗画合一非仅此一种。

船北马”这样典型的概括^①，自觉比较南北风土民情的不同，尊南抑北^②，是他们在诗中共同的抒情叙事策略。如《苇杭游记》云：

北清无水利之便，劳驴背马脚多矣；南清则不然，凿沟渠以分江水，挟水构屋，往往屋前无路，以水为路，舟楫往来户庭。乃知彼所谓“南船北马”，不啻匆忙之谓，亦记其实也。

万里秦城鞍马过，六朝萧寺笋舆寻。（《苇杭游记》附录四，胜岛仙题诗）

燕市风尘谁荡涤，鸡林塔阁几登寻？（《苇杭游记》附录四，高岛张辅题诗）

民情异趣江南北，定识观风察古今。（《苇杭游记》附录五，松浦厚题诗）

股野是从北方入中国，一路走来，南北差异的感受新鲜真切，所以他在京城抱怨：“衣上风霾积三寸，燕京到处土如灰。”（十月十四日）一过黄河，就有自己家乡的感觉：“过河则风物一变，山青水清，绿树茅屋，田畴狭小，畛域判然。养花曝雪，稻实收金，光景有似我邦者。”（十月十五日）“二日朝，佣轿抵城中玄妙观，观内热闹，若我浅草寺。”（十一月二日）评点此集的诸友人亦有同感：“河南北风土之异，古今亦然”（中洲语）；“风土一变，文亦一变”（凤洲语）。他游西湖湖心亭的诗，友人中洲评点：“北清恐无此种景趣。”

无独有偶，《禹域游草》的作者也有同样的感受：

一望田畴麦杂桑，接天遥见菜花黄。客愁忽散缘何事，笑道松江是故乡。余生松江藩，偶以地名相同，三四故云。（《过松江驿书感》）

禹域山川仔细探，路依扬子北仍南。游吴窥蜀程超万，探胜寻奇峡泝三。归到琼江鱼脍腻，行过摄市酒泉甘。我邦风物令人快，乔木蒸云水染蓝。余漫游中所经除扬子江上流、杭州西湖、姑苏、灵岩、天平之外，概童山浊水也，第七八句故云。（《宴酣余辞东归，汽车中书感》）

将江南认同为故乡，是日本游记的普遍感受^③。后一首诗中，作者对比江南与华中、江右等地，得出结论除江南外皆“童山浊水”，这也是江南在日本人心

①如《江南游藻》序称：“余往年在支那久矣。南船北马，细观彼土名山大川。”

②在日本诗人看来，江南的坟场也是充满生机的，与北方不一样。如青木正儿《江南春》：“翌日早晨再次来到那里，只见冢群高低起伏，野水潺潺流淌其间，平坦处有麦田、油菜田和紫云英像一幅镶嵌的图案，水边有洗衣的少女，水面上浮着鸭群，冢上放牧着活泼的山羊，柳树下拴着懒洋洋的水牛，我坐在冢上想到——为什么汉代的诗人们那样悲伤地吟咏累累古冢呢？我还没有见过洛阳长安的坟冢，不能理解诗人们的心情，但至少南方的坟冢决没有那种阴郁的气氛。在日本的墓地排列着冷冷的石块，即使是鸟语花香的好时节，我也从未把那里当作散步的好去处。”（《两个日本汉学家的中国纪行》，第98页）

③如青木正儿《江南春》称：“早晨从苏州出发时我的心情就很愉快，从车窗眺望油菜地和青麦田，不知不觉好像正旅行在日本的国土上……经过了上海、苏州的我，好像从大阪回到京都一样感到安心和熟悉，连栖霞山前的景色也变得酷似京都了。”（《两个日本汉学家的中国纪行》，第105页）

中仍然有很高评价的一个例证。

《吴楚游草》的作者前田大概没有去过北方,无从比较,但是细读他的诗歌,也多少看出他对当时北方中原的总体负面印象:

禹域如今谁将将,多多益善亦无才。萧萧落木中原冷,残日秋风韩信台。(《浦口望韩信台》)

谈到人才问题,不是一般泛泛的吊古伤今,而是讽喻中原人才已空。

2.文化“青眼”与文明的正视

日本汉诗人对于汉文化浸淫甚深,对于具有中华古典深度与浓度的江南文化胜景与风土人情,知之甚稔,融合他们原有的积累,所到之处,在在激活他们的学养、刺激他们的情感、验证他们的知识,因而旅行变成青眼有加的享受,情投意合的约会。如下《苇杭游记》的诗句云:

月落乌啼惊客魂,乾坤犹有一诗存。

古钟声断新钟续,夜半江枫渔火村。(十一月二日游记)

休言处士有儿墓,仍是梅妻鹤子人。(十一月五日游记)

有时断碣剥苔读,到处名流投次寻。(九月二十日游记)

松田在西湖,看见的柳树,无往而不是苏轼的树,看见的梅花,无往而不是林和靖的花:“林家梅又苏家柳,粉饰西湖志上来。”(《客馆水楼偶兴》)伊藤鸳城在绍兴,看见禹王庙,感慨“我日光庙之壮丽,或采于兹耶?”(《会稽禹王庙图》)在苏州,看见天平山,也疑心“我西都天枫或出于兹”(《天平联驴图》)。在杭州灵隐寺烟霞洞中游,想起的是庄子的典故:“如壑藏舟穿灵壁,疑是混沌犹未死。”(《烟霞洞》)前田慧云在苏州,看见普通的吴地女子,也似乎遇见了吴宫仙娃:“认得吴王遗韵在,斜阳画舫载佳人”;看见普通的渔民,也恍然间看见了唐代诗人陆龟蒙来了:“笠泽烟笼午未晴,白芦红蓼水纵横。漾船莫是天随子,蓑袂檐簷残滴声。”(《二十七日赴杭州途次过松江书所见此日晴雨靡常》)我们从《禹域游草》的小序的语气中,可以感受到诗人松田完全不像是一个外国游客,没有异乡的感觉。他几乎是将中土当作自家的祖国来旅行。作为一个汉诗人,从古典文学中知道了江南地名与胜景的美妙,常常在诗中流露出他这方面较多的知识。如江南的名胜:“焦山嶋下夜系船,胜境喜闻天下传”、“一抹春山染眉黛,傍人说是润州城”,如江南的美食:“巨口细鳞与鲈似,平生惯见画图里……何料年来画中物,天许远客恣老饕。”(《屡食鳊鱼书感》)喜欢化用有关江南的成句与名典入诗,是这四种江南纪游记诗的共同特点。如云:

车帟快受凯风来,千里桑田嫩绿堆。五月临平山下路,汀洲未见藕花开。(《禹域游草·过临平山下,忆僧道潜诗》)

中断楚江疑鬼工,危岩对峙势巃嵒。千秋不变东流水,船在青莲妙句中。(《禹域游草·天门山》)

鳊鱼登钓已春酣,两岸垂杨拂碧潭。万里平安能健饭,落花风里过江

南。（《禹域游草·寄内》）

蟠踞魁然逼九昊，香炉剑岳竞嶙峋。鄱阳湖畔骑驴去，看得庐山面目真。苏东坡句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禹域游草·庐山》）

飞塔穿云知北固，垂杨夹水到扬州。坡公评鹭谁疑议，胜境长江最是尤。（《禹域游草·游金山寺》）

浙江近暎沧溟日，欲送胥潮直到门。宋之问灵隐诗曰“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盖韬光宝景也。（《吴楚游草·韬光庵》）

平芜千里雨初收，水没柳塘眠水牛。何处江湖皮陆社，碧空蒙里入苏州。（《江南游藻·过松江驿怀甫里祠》）

晚辞客舍入苏城，塔式含山落照明。乌帽青衫堪画否，杨花风里跨驴行。（《江南游藻·苏州城》）

他们还喜欢模仿中国诗人的名诗结构，如伊藤的“南宋城堞百千雉，绕沟芳草紫云波。山川襟带浓如画，只有吴儿唱棹歌”（《舟绕绍兴驿吊南宋城址》），分明是向李白《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乡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致敬。

他们还特别喜欢诗、禅相通的典掌。譬如《禹域游草》的作者松田用参寥（即道潜）的诗句来代替自己的感受，而《吴楚游草》的作者前田慧云过临平时，也以参寥的诗句为抒情图式：“风蒲猎猎舞蜻蜓，想见花时红藕明。曾诵参寥好诗句，依稀光景认临平。”（《临平》）又如他们都喜欢金山寺，而且都同样喜欢苏轼玉带换袈裟的故事^①。伊藤云：“今日山门观玉带，卅年渴想一时销。”（《镇江金山寺图》）松田亦曰：“笑解腰间苍玉带，山门作镇已千秋。”（《管长普静大和尚，相迎茶谈，出示苏东坡玉带及书轴等》）

也就是说，文化与文学上的意象江南，早已建构了他们的前理解。然而，另一方面，近代江南社会现实破败，使他们不得不感受到文化江南与现实江南的精神落差，这又逼他们不得不以文明发展的眼光来正视：如股野琢在苏州的游记云：“闻唐代藏经罹堡贼灾，悉归乌有，可惜也。午后又佣轿子，经二里抵寒山寺，小院荒废，有一钟，系近时新铸，闻团匪之乱，古钟为恶汉所夺，落上海古董商手。后转归我富山县某寺，寺僧当铸造大钟，投之炉中以充其用云。张继《枫江夜泊》诗，脍炙人口，今唯有文徵明勒其诗之断碑，他无足观者；枫江亦一小渠耳，使人呆然。”（《苇杭游记》）（凤洲评点：“古迹煞风景，往往有此类。”）虽然退休的法官松田对江南有很高的期望，如云“惊见东洋之一角，欧言米语即龙敦。世人称上海谓东洋之龙敦（伦敦）”（《舰达上海，三月十三日》），但是他可能更多的是失望。因为他所读到的中国文学中有关江南的美文，与他亲

^①苏轼《以玉带施元长老元以衲裙相报次韵》之一：“病骨难堪玉带围，钝根仍落箭锋机。”

后人演义而为与金山寺主持诗禅机锋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借苏轼来表达皇权向佛门致敬，是中国佛教最美的故事之一。在日本人心目中，皇权的尊严很高，但是最高的尊严还是佛教的尊严。

眼所见的现实有落差。这个落差一是古典中国面临着巨大的世变,文化精神气脉明显断裂。如云:

山河举目秋风冷,无复新亭对泣人。(《吴楚游草·已上二首石头城址》)

断墙花笑为谁娇,世换无人守庙桃。(《禹域游草·明太祖》)

谁今振木铎,叹息德之衰。(《禹域游草·宣圣庙在秦淮河岸》)

崇业萃贤标里门,黉堂虽陋老师尊。圣贤之道行将废,挟册童皆奉兔园。(《禹域游草·沪上学堂崇业、萃贤并里名》)

纷纷香火簇舟车,武穆崇祠祭不疏。却是青山秋草里,无人复识宋皇居。(《吴楚游草·鄂王庙》)

《沪上学堂》诗中,诗人松田观察到根深蒂固的儒教道德观念还残留在民间与日常生活,而世俗化的教育已经开始改造下一代了。《鄂王庙》中,诗人前田慧云以日本尊王室、崇帝制的观念,反过来看近代中国人的世俗化:岳飞的精忠报国得到了现代民族精神的发扬,而那深山里的南宋皇居遗迹,却深深掩埋了。

另一是现实中国社会的破败。因而,他们往往将古典江南的意象,与现实江南的衰败,对照在一起。如:

吴淞春色静朝晖,一岸人家拥钓矶。曾被并刀剪将去,当年胜景已成非。杜甫句云:“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今不见好景,盖因地变然耶?(《苇杭游记·晚搭岳阳舰过吴淞》)

岸上晴沙乱涨痕,无山无阜豁乾坤。水晶宫阙在何处,嫩柳疏桃鱼蟹村。张羽句云:“水晶宫阙梦吴淞”。(同上)

千仞振衣俯古吴,秋风百里冷荒墟。豪华雄略两成梦,不独当年王阖闾。(《吴楚游草·绝顶俯瞰吴中形势》)

残柳枯荷乱拥坡,六朝遗迹雨声多。莫愁纵是湖名好,奈此荒凉秋邑何。(《吴楚游草·莫愁湖》)

试问今何时,上下俱无恃。(《江南游藻·彭泽归舟图》)

云连旌旆红毛馆,雨长蒿莱黄歇祠。欲以侏离嘲缺舌,却怜木石竟吴儿。天涯我是观风客,阅到沧桑泪不支。(《江南游藻·上海杂感》)

这几首表面看起来并没有涉及到现实江南,其实讽喻与伤感暗含在语气间。总之,日本汉诗人的一个共同的心态是,渐渐由同文的文化共同体内部感受,转变而为脱离共同体的外部感受。他们多多少少开始疏离那种休戚与共的生命气息,升起一种复杂的、混合着旁观者、考察者、背叛者和共命人相纠结的心绪。这是这类诗歌最微妙的地方。从大的方面来说,吉川幸次郎曾说,明治以后的日本人对中华文化有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是对近代中国颇为鄙视,一是对古代中国大为推崇^①。鄙视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看到中国政治腐败、民气凋伤,

^①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4页。

另一方面也正是日本处于明治维新之后的振兴阶段，他们的新的主体性正在生长建构之中。这就要谈到他们用以观察江南时背后的日本主体性框架。

3. 江南意象的东洋化及其他

正如蔡毅指出：“江戸中期以降，日本汉诗开始了‘日本化’的探索，即在遵守汉诗基本规范的同时，也力求体现岛国风情，东瀛特色。这一动向，与当时日本开始增强文化自信、倡导国粹思想的潮流，是一致的。”^①譬如，如前所论，以日本尊王室的理念来看江南，就觉得现代中国太缺少天朝的尊严。他们会对皇帝的遗迹别具慧心。如松田在杭州的伤感和前田、伊藤在南京等地的欣喜：

何人妙笔画成图，山媚水明天下无。翠辇不来春殿寂，雕栏半日对西湖。乾隆离宫在孤山之顶，今仅存一楹耳。（《禹域游草·西湖绝句》）

石人无语立寒芜，五百餘秋一梦徂。犹胜当年典型在，环陵霜叶灿如朱。（《吴楚游草·明孝陵》）

千年古塔耸烟峦，隔柳高低影不寒。初感乾隆天子诏，名山爱护寺楼看。乾隆帝诏曰：“勿毁寺楼，以助名山好观。”（《江南游藻·西湖雷峰图》）

皇帝睿藻诸公题，文墨风流满绢纸。（《江南游藻·镇江金山寺图》）

曾经写过《中国文明记》的大正时期的思想家宇野哲人，在比较中日关于尊王的观念不同时说：“我国王政维新之际，上有万世一系之皇室，可使人心归一，而于中国，打倒满清王室以后，又有谁人能够取而代之？每念及此，吾人感谢我国国体之尊，又转而哀悯中国国体易姓革命之不幸。”^②

此外，日本汉诗人会在江南意象中强调地融入一些很深层的东方思想。譬如松田谈江南的美食：

禹域由来重割烹，郇厨鼎鼐久传名。阿衡若准盐梅法，海晏河清天下平。（《屡食支那鼎食有感》）

盐梅法的核心是一个“和”字。这当然是一个古老的中土思想。但是在近代社会的大变局动荡中，却已经成为已陈之刍狗。而日本文化发扬光大了这一东方思想。这首诗在今天看来，也颇有思想光彩。

用次韵等手法，将日本前辈纪游的史实经典化，这也是他们将江南意象东洋化的一个手法。如伊藤次韵禾原古琴台题诗：

古琴台上叹来迟，万里仙槎维缆时。一代峨洋名士曲，四桁山水有声诗。梧青琴榻雨初过，荷白月湖风缓吹。湖海真逢赏音者，孰辞也有绝弦期。（《古琴台次禾原题壁韵》）

中日两国诗人都常用清/浊二元这样的观念去看待世界，但是日本诗人则有更注重在同一地景中，发挥运用如此的认知图式。如云：

^①蔡毅：《日本汉诗在中国》，在上海师范大学的讲演，2012年4月26日。<http://bbs.zhsc.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57204>

^②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中华书局，2008年，第187-189页。

梵宫占断小姑山，隔绝人寰难可攀。谁识乾坤清若许，终身起卧浊流间。又行二时，抵金鸡山下，山颇高，东南趾即彭泽县，不知今有继陶令高风者否？一巨岩耸而前，如鸡笼，高数仞，斗立中流，草树被之，号曰“小姑山”。顶置一亭，腹嵌一寺，朱栏白壁，屋三层，四面嵒然若无路者，不知何人创开，何人今往，人间断缘，岂复有若是者乎？（《苇杭游记·小姑山》）

袅袅茶烟出薜萝，万岩压寺路盘陀。云泉何有人间意，不分山中俗客多。山腹有泉一泓，号白云泉。寺僧卖茶延客，白乐天有诗曰“何必奔冲山下去，只添波浪向人间”。（《吴楚游草·天平山》）

前一首，以清浊对比写小孤山的表面上与人间断缘，其实即世间而超世间，“终身起卧浊流间”，即终身与人世相俯仰。后一首，写寺僧卖茶延客，以泉水的口吻，写出深藏山中的泉水，也终不免世俗化的命运。

三、四种江南纪游诗的一些不同特色

退休法官松田的诗风清淡随意，手挥口占，不求精工，有粗服乱头的自在。他的诗有点像日记体，自由记录旅行的生活场景。在上海期间，曾与画家、实业家王一亭聚餐，一见如故，笔谈至烛光见底（“见烛跋”），有诗四首实录当时笔谈内容，交流甚契，场面生动，可补《王一亭年谱长编》^①及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之阙：

五月中七，高野氏张宴沪上，招待中外诸绅士，予亦与焉，与王氏一亭名震笔谈赠答，见烛跋而别。

飞楼邂逅喜何堪，诗酒风流兴更酣。不用象胥传译雷，语难通处笔成谈。

传觞不觉漏声移，快话更端几解颐。一见真成如有旧，订交便恨十年迟。

触讳遭灾彼一时，乐夫天命复奚疑。平生只待风云会，毕竟蛟龙不在池。一亭曾与黄兴罹党祸，后免焉。

当时罹祸也夷然，混迹风尘志益坚。却养心机深悟道，毫端喜写达摩禅。一亭氏善诗画，好写达摩像。

总之，《禹域游草》更多的是一位没有心机、却富于生命热情的老诗人，以旅行自验其所学深浅的游览文学。其特点是，绝句多，篇幅短小，诗思轻灵。正如冈崎所评：“大抵随手而成，善道实际，使人有身历目睹之想……轻轻着笔，不费刻削，平衍流利，自然合拍，此乃姜白石所谓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者，亦足以见其诗境老熟矣。”^②值得细读的是诗人的中国心态，既有追随，又略有俯视，既浪漫，又清醒，是近代日本典型心态。

^①王中秀著，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

^②《禹域游草》附录，冈崎《书禹域游草后》。

伊藤的诗风也是清新自然一路,却变化稍多,无论诗体的五言七言,歌行与绝句,还是题材与语言的多样,句子的提炼与思想的深度,以及对中国传统的正解,似也要比松田略高一筹。诗风有点性灵派的味道。与松田比较,他更有学者气质。如《彭泽归舟图》既以“先生非弃民,必也如伤视”这样极准确的评价来表达对渊明的理解,更写《渊明故宅图》,通过后人的访问、实地的踏勘,写出陶渊明精神,往往比仅是纸上得来的更真切:

数里田畴道,初访柴桑村。萧条野桥侧,开埭放鸡豚。桑麻五亩宅,榆柳荫自繁。曰是陶公址,千载有儿孙。问姓只首肯,问祖不成言。初悟先生志,功名绝蒂根。南山当户秀,有酒犹盈樽。饮食通邻舍,情话集一门。魏晋何可问,已忘今所存。悠哉别天地,仿佛入桃源。(《渊明故宅图》(家庙奠一杯请其器而归))

伊藤往往能片言中的,写出江南精神。如写林和靖:

苏公栽柳,岳王就刑,独有先生异世遇,湖山碧万顷,梅花只两句。(《林处士墓次苏道人原韵》)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诗画合集。他真正很爱江南,一笔一画总关情。他的背后居然有一个“江南吟社”。社里的头儿,他的友人渡边给他的诗画合集很高的评价:“从来诗画王摩诘,首倡东瀛孰夺朱。”^①确是近代很有特色的一种汉诗别集。

如果说上面两位老人属于简单的诗人,而股野就是一个政治性的达官诗人,他更能把握时代主流的精神调子。《苇杭游草》的特点是诗文合一,议论极多。作者费时五十七天,行程三千里,一路从北方走来,过山海关、万里长城,易水幽燕、黄河,格局更大,感慨更多。再加上他的身份是帝国博物馆的总长,旅行的性质是官游,因而呼朋引类,开合自如,题材显得更为多样,视野更为开展。同时,也有学者的考订、官员的考查等精神融注其中。正如序所说:“雄都之风物、江山之伟迹,宾朋邂逅,胜会征逐。或览宝库,或品古器……视之,从来游海外纪其行者,可谓出一头地矣。君今为帝室博物馆总长,纂此行所获数千年古国之古典事物,征之博古之学,参互考订以发其旨趣。”他对古典中国、对江南文脉,有很深的领会,然而,与其他几种相比较,他似乎更多理性、自上而下的心态,处处有对清政府官员的迂讷无文、以及中国社会文明的落后,持一种批评的态度。也许,他的诗文合一的形式,恰好可以用来平衡理性与感性;而他相当敏感的南北区别,也可以作为一种框架,托起他对古典中国与文化中国的复杂感情。当然,敏感的读者还可以从中多少读出一二帝国心理。譬如作跋的同学之一,就曾经从他自己的“舟车到处人迎送,得此优游亦圣恩”一句不经意之词,读出日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征服者的帝国心态:

然非我皇多年经营满韩之地,扫攘障害,亦不能舟车安稳为此快游。

^①《江南游藻》渡边白峰题识。

则诗中所谓“舟车到处人迎送，得此优游亦圣恩”，可谓知其所因者矣。
(三嶋中洲跋)

而《吴楚游草》的作者是一真纯的学人兼佛门宗师，他似乎不关心现实中国的问题，更多沉浸于古典的世界。当然，他的诗歌却并无释子气与书袋气，自在真切，触处生春，有一种喜气与机趣，似乎是学杨万里、袁小修一路。有些议论也颇有自己的见解，如写运河：

河堤叠石土功新，运路钦看长利民。真个盖棺论始定，当年老虎是仁人。朱宝山，曾知扬州，为政稍苛，人呼曰老虎。然抢私财，修运河堤防，两岸迭石数十里，坚牢可观，今日往来舟人，皆称其德云。(《泝运河抵扬州舟中三首》之三)

可能前田慧云的西湖诗及江南名胜诗，是写得最详尽细致的。他在杭州只呆了三天，得诗十八首。离开杭州前夕写的诗句“预识故园归卧夜，仍劳魂梦到杭州”，流露的感情也较为深切。

由于纪游诗多写于途中，这四种汉诗都写得比较浅露直白，情随境生，自然感发。但是由于他们所歌咏的江南古典名胜，有足够的内涵作诗料，因而成全了他们的诗歌情意婉至，一唱三叹，而不至于太俗白。或许，江南因为有许多可以令人吊古伤今的胜地意象，因而潜意识里可以满足日本近代汉诗人们那种既钟爱又轻蔑的矛盾心态？因为他们的传播，这些江南的胜地与名典也成全了一次跨洋的东行，继续吸引着后来的学者兼诗人如内藤湖南、吉川幸次郎、青木正儿等人的江南想象。

感谢薛莹、王慧、虞海娜、王陆正同学将四种汉诗输入电脑。

作者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所、中文系